

文学研究

解读“诗史”精神

孙明君

内容提要 千百年来,杜诗学的研究者们在对“诗史”的阐释中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史料;其二,认定“诗史”乃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样板。本文旨在辨析这两种误解,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既不能仅仅把诗史等同于史料,也不能把诗史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出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征的“第一等真诗”。当今诗坛所缺乏的正是此一“诗史”精神。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性的小诗,然而更加需要的是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一个拒绝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诗坛。

关键词 诗史 仁者心 天下意识 忧患意识

仇沧柱云:“自古诗人之穷,未有如子美者。”(杨伦:《杜诗镜铨》)此乃是就杜甫生前之人生境遇而言的。若从杜甫身后的遭际着眼,“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从这层意义上说,自古诗人之幸,未有如子美者。千百年来,千家注杜,杜诗研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杜诗学”、“杜学”,建国以来,杜诗研究也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

在文化史上,存在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一位士人也好,一部作品也好,被人关注的起点,也就是误解的开始。名气愈大,阐释者愈众,歧解愈多,误解愈深。杜诗是“诗史”,杜甫是“诗圣”,这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然而,正是在这里存在着最明显的误解。误解一,将“诗史”等同于历史、史料;误解二,认定“诗史”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工具。本文的意旨就在于辨析这两种误解,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意义。

“诗史”一说最早见于唐人孟 的《本事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据此可知,“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广泛流传。何为“诗史”,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理解。纵观历代典籍,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杜诗具有“史”的认识价值,部分论者在不同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等同于史料。

研究界主流话语对诗史的解读是这样的:宋祁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

衰,世号诗史。”(《新唐书·杜甫传》)李朴云:“唐人称子美为诗史者,谓能记一时事耳。”(《与杨宣德书》,《余师录》卷三)李复云:“杜诗谓之诗史,以斑斑可见当时。”(《与侯谔秀才书》,《水集》卷五)惠洪云:“故老杜之诗,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冷斋夜话》)蔡居厚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蔡宽夫诗话》)陈岩肖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溪溪诗话》卷上)……

与此同时,众多的学者开始走上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不归之路。晚唐时,李肇的《唐国史补》,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郑 的《开天传信录》,康骞《剧谈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人们发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杜诗中都有反映,如:《悲陈陶》、《悲青坂》记叙了至德元年(756)唐军与安史叛军在咸阳附近的两场血战。战斗中,“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悲青坂》《草堂》一诗“以草堂去来为主,而叙四川一时寇乱情形,并带入天下,铺陈始终,畅极淋漓,岂非诗史”。(杨伦:《杜诗镜铨》)杜诗不仅可以证史,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史书未载的史实,可以杜诗补史之阙。如:《有感》:“邵云:五首皆纪时事。”“所言皆当时大事要著,足补国史所未逮。”(杨伦:《杜诗镜铨》)《三川观水涨》记载了诗人欲往灵武投奔肃宗的路上遇见的一场水灾,“是年史不书大水,可以补史之阙”。(杨伦:《杜诗镜铨》)《草堂》,“徐知道(作乱)事,史俱不载,此诗可以作史补”。(《读杜心解》)《自平》一诗写于“蛮溪豪族小动摇”之时,希望朝廷不要听信宦官之言,兴兵生事,扩大动乱,蒋弱六云:“此亦可备诗史”(杨伦:《杜诗镜铨》),更有甚者,有人据杜诗而讨论唐代酒价几何。(见宋僧文莹:《玉壶诗话》)。

在近代的唐诗研究中,陈寅恪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完善化,达到了会解圆通的境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也极为重视对唐诗史料的利用,他在研究唐代交通问题时,引用唐诗作证处在一千条以上。他说:“至于杜诗,号称诗史,史料价值更高。”“十几年前,我曾应新亚书院中文系之邀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杜诗述史’,说明杜诗有些篇章可作列传看待,此外又列举关涉中央政情与政制、社会生活、地方风俗、产业、交通、都市、商业、教育、文化各方面的诗篇数百条,实见杜诗中史料之富。”^①新时期以来,诗史互证的方法已成为学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是的,杜诗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论者从杜诗中可以寻绎出天文史、地理史、宗教史、民俗史、考古史、军事史、音乐史、美术史、建筑史……的相关史料,但归根结底,以诗证史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文学研究当然有一定的辅助,但它不能代替文学研究(以史证诗固然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不过它只是诸多方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时代的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诗史的史料价值,却忽略了诗史在历史学研究之外的意义。有些学者在研究时牵强附会,肆意歪曲,使诗史研究滑入歧途。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大抵自诗史之说兴,而注杜者多附会史实之论。……注家求深得啗,求明转繁,啗近于诬,繁易成芜,诬与芜兼,非缪则秽,于是杜诗之真面目,真精神,反变得不易理解了。”^②

诗歌是诗人具有独特魅力之情感的凝结与投射,它与客观、理性见长的历史著作之间有不可混淆的区别。黑格尔指出:“诗纵然也诉诸感性观照,也进行生动鲜明的描绘,但就连在这方面,诗也还是一种精神活动,它只为提供内心观照而工作。”“连最完美的历史著作毕竟不属于自由的艺术,甚至用诗的词藻和韵律来写成历史著作,也不因此就变成诗。……历史家没有理由抛开他所处理的内容中的散文性的性格特征,或是把它们转变为诗的。他须如其本然地描述摆在面前的事实,而不加以歪曲或利用诗的方式去改造。”^③苏珊·朗格亦指出:“诗人是以心

理方式编织事件，而不是把它当作一段客观的历史。……因此倾向性是诗的世界的主要问题。”^④诗史是诗而不是史，是诗史之诗，而非诗史之史。“精神活动”、“内心观照”、“心理方式”和“倾向性”是诗之所以为诗的重要特征，诗史之诗亦不例外。历史著作可以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而诗歌则完全属于个人的创作，只能是个体心灵的投射，是诗人的主体心灵观察、过滤、筛选之后的历史现象，其中浸透了诗人的情感，打上了诗人的爱憎的烙印。所以，我们对诗史的定义和探究不能以史为重心，而必须以诗为重心。诗史，不是过去的史实的原始记录，也不是当下的历史的“镜子”般的再现，故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以诗证史的工具。本文认为，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征（地负海涵，沉郁顿挫）的诗歌。

对诗史的误解之二是将诗史与政教相绾和，实际上将诗史之诗视之为政教的工具。检视杜诗，不难发现忠君爱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封建时代，众多的学者认定杜甫是忠君的典范，是一位“一饭未尝忘君”的“诗圣”。与之相对，到了建国以后，学界则给杜甫戴上了“人民诗人”的桂冠。

“诗圣”的提法首见于明人王嗣 的《梦杜少陵作》：“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凡是被儒士尊为“圣人”的人都被认为已进入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诗歌虽然也隶属于艺术门类，但“诗圣”却与“画圣”、“书圣”（草圣）、“乐圣”不同，前者不仅指此人在该艺术门类上的出神入化的造诣，而且与人伦领域的“圣人”达到了同样的道德高度。“伯夷，圣之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孟子·万章》）在宋人的心目中，杜甫是诗界的圣人。秦观《韩愈论》云：“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子美诗，读之使人凜然兴起，肃然起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云：“杜子美……声落万古，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云：“少陵巨编……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宋人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不仅是指杜诗在艺术上的集大成，而且，由于杜甫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忠君者。在许多宋人的眼里后者更为重要。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陈俊卿《溪诗话序》亦云：“杜子美诗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落困蹶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

的确，杜甫是忠君的，但显然未达到什么每饭不忘的地步。同时，他的忠不是愚忠。为了证明杜甫每饭不忘君，在阐释杜甫诗史性作品时，古人往往生拉硬扯，肆意歪曲，削足适履。例如，从《丽人行》、《哀江头》、《北征》等诗中看，杜甫对杨氏兄妹多有讽刺。在《北征》中以杨妃比褒、妲，宋人却说：“唐人咏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称者，……抑已失臣下事君之体矣。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官军何预焉？”（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黷之耶？唯杜子美则不然，……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张戒：《岁寒堂诗话》）杜甫曾经寄希望于皇帝，但他的心目中有一个高于皇权的存在，那就是“道”。从道不从君是原始儒学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在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的挤压下弯曲变形，只存在于在少数优秀士人身上。杜甫虽然不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以道为重。古人说：“老杜似孟子”（黄彻：《溪诗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人所目睹的现实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人回家后，“幼子饥已卒”，当此之时，诗人对“君臣留欢娱”

的现象持何种态度是不言自明的。连张戒也不得不承认《洗兵马》“意乃讽肃宗”。（《岁寒堂诗话》）在左拾遗任上，他秉公直言，不怕触怒“圣上”，充分表现出古之遗直从道不从君的精神风貌。在华州司功任上，他不堪其簿书之急，“束带发狂欲大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后来毅然辞官而去，这也不是“每饭不忘君”者所应有的态度。忠君是封建时代伦理纲常学说的核心，视杜诗为忠君的典型，实际上将杜诗降低为经学的附庸，歪曲了杜诗的诗史精神的真正价值，抹杀了杜诗的艺术魅力。

建国以来，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诗人，不论其自觉与否，他总是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上，按照一定阶级的观点，根据一定阶级的要求来观察、理解、描写社会生活，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非常幸运（或者说不幸）的是杜甫被封为“人民诗人”，其诗被视为“时代的镜子”。傅庚生先生和李汝伦先生的下列观点代表了50年代至80年代学术界的基本看法，傅庚生先生在1954年说：“第八世纪祖国伟大的诗人杜甫，他真心地为人民而歌唱，为人民而战斗，讽刺奚落着当时的王朝统治阶级，以号称‘诗史’的横扫千军的诗笔暴露现实的丑恶；……而战斗的诗篇鼓舞着、激励着前进的人民，直到千余年后，人民起来高唱起封建社会的葬歌。”^⑤李汝伦先生在出版于80年代的《杜诗论稿》中说：“（杜甫）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他是鲁迅所说的那种‘为人民请命的人’，他的作品中很多是列宁讲的每个民族都有的那种民主主义文化。”^⑥的确，杜甫是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就是明证。但我们也要承认，由于时代的局限，杜甫不可能成为被剥削阶级的代表，按照阶级斗争年代的分类法，杜甫无疑属于地主阶级，他对于剥削阶级的总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员照样充满了同情和仁爱之心。《哀王孙》系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见王孙颠沛流离而作，诗中对“龙种自与常人异”的落难王孙表示出极度的关切，忠贞之情，溢于言表。《喜达行在所》“三首艰难之情，忠爱之念，一一写出，读之恻恻动人。”（杨伦：《杜诗镜铨》，引张上若语）《夔府书怀》写自己曾受恩于朝廷，现在虽位卑人轻，流落他乡，却不敢置国事于度外。“浦二田云：此首抒怀，叹老嗟卑之意轻，主忧臣辱之思切，在江湖而忧魏阙，所谓每饭不忘者也。”（杨伦：《杜诗镜铨》）《闻河北节度入朝口号》，刘克庄云：“欲主上如周宣汉武，欲诸公为孝子忠臣，真一饭不忘君者。”（《诗话新集》）“一饭未尝忘君”云云，固然是宋儒的陋见，然杜甫有忠君之心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表面看来，忠君说与人民诗人说针锋相对，其实，二者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诗歌视为政教之工具，要求文学自觉“服务”于政教。在某些时期，文学也曾经变成演绎政教的话语形态。如白居易等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如极左年代里创作的“三突出”、“主题先行”的作品。同样是摹写时事，杜甫的诗史之作与白居易的新乐府截然不同。叶嘉莹先生说：“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他们的作品中所有的道德，也往往仅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善恶是非之辨而已，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则不然，那不是出于理性的善恶是非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是非善恶之辨乃由于向外之寻求，故其所得者浅；深厚自然之情则由于天性之含蕴，故其所有者深。”^⑦诚然，两种文学最大的区别是：杜甫诗史是其仁者心的自然流露，而白居易的新乐府是一种主题先行的“向外之寻求”。文学是自由的，它不是某些人手中的工具，不是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婢女。在此，对叶先生所谓“天性之含蕴”有必要予以辨析。“天性”云云，古人早已道及，俞文豹曾云：“杜子美爱君之意，出于天性，非他人所能及。”（《吹剑三录》）“天性”即“天命之性”，它强调的是先天的自然秉赋，忽略了后天的主观的性情之培育。将杜甫之仁心完全归结于天性，既与杜甫之实际情况不符，也易于造成一种错觉：让天性中有

仁心的诗人去表现其仁心吧,天性中没有仁心的诗人可以心安理得地表现非仁非义之情之境,这正好可以给“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作家提供一种口实。其实,杜甫的仁者心、天下意识、忧患意识不完全出于先天所生,更重要的是源于后天自觉的蓄养、扩充。具备了仁者心、天下意识、忧患意识的杜甫,他只是以其仁者心观察社会、思考社会、再现社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百姓,无不入其视野之中。其仁心的光辉自然地向外溢发、扩充,弥漫于天地之间。于是,忠君爱民自然是其诗史之作的重要内涵,但其诗史之作又不是忠君爱民所能范围的。

3 我国自古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曾经是文学的核心,是一切艺术的核心。然而,今天的诗坛却变得不尽如人意。“90年代以来,诗歌的状况一落千丈,进入了令人苦恼的低迷期,读者明显减少。一家媒体曾在随机抽查的1500人中发现,只有3%的人读诗。全国最大的诗歌刊物《诗刊》的发行量也从80年代的53万份跌落至目前的4万多份。作为泱泱诗歌大国,诗歌到底怎么了?症结何在?⑧表面上看,诗歌创作出现了新诗潮、后新诗潮。但他们越来越强调独语的个人化,过分关注一己的得失,只强调和夸大个人的痛苦,无法走出精神的“自恋”情结。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的小诗,时代也需要反映时代脉搏的、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一个拒绝天下意识、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诗坛。

当今的诗坛(包括文坛)所缺乏的正是“诗史”精神。

杜甫《过津口》诗云:“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这一存在于诗人主体心灵中的“仁者心”正是“诗史”精神的核心。此处之“仁者心”广大无边,不是匹夫匹妇之小仁,而是志士之大仁,亦即是含摄了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之仁者心。此“仁者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完全契合于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是孔子给士人规定的大任,孟子也说:“圣之任者,……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万章下》)在此,有必要提醒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下”有其独特的内涵,它既有别于“国家”,亦不是指一定的空间地理,“天下”的独特语境涵义,就是为儒学所建立的这种作为权力原初依据的大公与民本观念。它内蓄着对社会公正道义的特守与执着”⑨。与天下意识紧密相连的是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衣食富贵,儒家面对忧患时并不追求一己的解脱。孔子云:“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仁者心、天下意识、忧患意识实则三位一体,彼此交融,相互含摄。

作为诗人的杜甫,他的诗歌乃是仁者心、天下意识、忧患意识在诗歌艺术领域的投射。杜甫的“仁者心”向外自然溢发,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中无不充溢着老杜的仁心。《秋野五首》其一云:“秋野日疏芜,寒江动碧虚。系舟蛮井络,卜宅楚村墟。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杜臆》评曰:“系舟蛮井’,卜宅楚村’,则去住尚未能自决也。‘枣从人打’,则人己一视;‘葵欲自锄’,则贵贱一视;‘盘餐’及‘溪鱼’,则物我一视:非见道何以有此?所见极是,在老杜这里仁心及物,物我一体。当然,在向外无限扩充的仁心中,最强烈持久的是他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对社会、民族、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面对自然风物,老杜依然不忘忧患,其《对雪》云:“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他人对雪必豪饮低唱,极其乐。唯老杜不然,每极天下之忧。”(《藏奎律髓》)其《秋雨叹》云:“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诗写无日不雨,无时不雨,大雨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祸害。诗人呼吁统治者轻敛薄赋,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诗人自己始终同情贫贱

者，心系贫贱者，《又呈吴郎》云：“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岁晏行》云：“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恩忍爱还租庸。……万国城头尽吹角，此曲哀悲何时终！”

沈德潜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语》）谭元春云：“老杜第一诗人，又是第一高人；人不第一，恐诗亦不能第一。”（《古诗归》）他们皆强调了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奉赠韦左丞丈》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其志之广大可知矣。因为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为其底蕴，所以这种大志绝非蹈空之论。他所承担的是平治天下的重荷，他所忧患的是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和前途。早在开元盛世，杜甫已经从表面的歌舞升平中感受到了隐含的危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写自己胸中“百忧”翻卷，似乎看到“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老杜一生忧国忧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他的绝命词中可以知道，让诗人死难瞑目的是天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动荡。

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并不是不写自己，而是在写自己的时候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鸡虫得失，不汲汲于个人的功名富贵，他们恪守原始儒家以民为本的观念，呼唤和恪守社会的公正道义，自觉地把个人与国家、天下联系起来。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详细地描写一己一家之忧患，但又不囿于一己一家之忧患。“穷困如此，而拳拳于国计民生，非希踪稷契者，讵克有此！”（杨伦：《杜诗镜铨》）《北征》书一代之事，其中有个人，有妻子，有儿女，有官军，有君主，“深忧长虑，谁信饥瘦老头，有此想头！”（《古诗归》，钟惺语）《唐宋诗醇》评《恨别》一诗云：“彼其流离漂泊，衣食不暇而关心国事，触绪辄来，所谓发乎性，止乎忠孝者，寻常词章之士，岂能望其项背哉！”在自己屋破饥寒之时，诗人所想的则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几时高议排金门，长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诗》）杜甫漂泊异地，自身老病，登临之处时时不忘天下，不忘时事。其《登楼》云：“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岳阳楼》云：“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其《秋兴八首》其四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年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杜臆》评曰：“则长安一破于禄山，再乱于朱，三陷于吐蕃，如弈棋之迭为胜负，而百年世事，有不胜悲者。”其仁心之广大，令人感佩。

第一等的襟抱是诞生第一等的真诗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了第一等之襟抱，当然还需要“读书破万卷”，需要“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吾师”，需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心锤炼，如此方可进入地负海涵、沉郁顿挫的艺术境界，“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⑩

诗史精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精神之一。在当代社会，为了继承和弘扬此一诗歌精神，必然要求每一位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摆脱物欲的束缚，走出个人的狭小空间，关心我们的民族，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的天下。诗人只有直面诗与时之间的本质联系，“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诗大序》），培育其仁者心、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大诗。

时代需要具有诗史精神的伟大诗篇，时代呼唤具备诗史精神的伟大诗人。

注: ①严耕望:《治史三书》,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郭绍虞:《杜诗镜铨·前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 年版。

③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第 19、39—42 页。

④苏珊·朗格著、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247 页。

⑤傅庚生:《杜甫诗论·前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⑥李汝伦:《杜诗论稿》,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3 页。

⑦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6 页。

⑧朱子峡:《读者给中国新诗打分——〈诗刊〉调查中国诗歌现状》,《文艺报》1998 年 9 月 3 日。

⑨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96 页。

⑩关于诗史精神的艺术魅力, 作者拟另外撰文论述。

(作者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真漫亚)

季羨林海外基金公布第一批学术资助项目 暨召开迎春座谈会

新年伊始, 由我校著名学者季羨林教授冠名的“北京大学季羨林海外基金”第一批资助项目启动。八部老教授论文集、七本专著和三个刊物获得了出版资助。1月12日下午, 基金理事会成员、首批获资助的项目人和有关院、系、所、部门负责人举行了迎春座谈。

该基金是 1995 年由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波先生出于对季羨林先生的敬仰和对北京大学的支持, 慨然捐资 200 万美元成立的。该基金的宗旨是: 为扶持和鼓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科建设, 促进学术文化交流与合作, 推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座谈会由基金管委会副主任、教务长吴同瑞教授主持。基金管委会主任郝斌教授首先讲话。他讲了基金的设立和宗旨, 讲了该基金的设立对推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还详细介绍了基金管委会的工作和活动情况, 提出了今后的打算。

与会者就如何充分发挥基金效益, 推动和提高我校人文和社会各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发表了中肯的见解。

季羨林先生亲临会场, 认真听取了各位与会者的发言, 并不时作记录。最后季老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 资助出版只是资金运作的第一步, 第二步可以考虑选择一百名在北大百年学术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加以介绍, 以显示北大在 20 世纪的辉煌; 可以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开讲座, 介绍学科前沿信息; 还可以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中搞论文评选, 以鼓励优秀科研成果。

他还讲到, 著名艺术家黄宗英和著名作家冯亦代夫妇捐出最近收到的稿费, 并允诺以后所有稿费都将全部捐出以壮基金的声势, 这实在是学坛盛事, 令人敬佩。

本刊有幸获得该基金第一批资助。学报主编龙协涛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他首先感谢季老、感谢基金管委会的负责同志对学报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学报 1995 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奖, 1997 年又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此次又获得以季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基金的第一批资助, 这些奖励和扶持得来不易。他表示一定要以这些鼓励为动力, 进一步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味, 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中把北京大学报办成世界一流的刊物。

(本刊记者 魏 宣)